

# 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影响效应： 理论、方法与证据\*

郑 磊 祁 翔 侯玉娜

**提 要：**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影响效应是社会科学的一个热门话题，许多研究数据都发现，父代的教育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因素对子代的教育获得或教育成就具有很大的影响。近年来，该话题在理论的创新、研究问题的广度以及研究方法的完善等方面均有所进展。本文回顾了近年来的相关研究，重点围绕以下两个问题进行综述：（1）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影响效应有多大？（2）这种代际影响的作用机制以及相应的政策干预措施。本文介绍了不同学科解释教育代际流动机制的理论，评述了测算教育代际相关系数和识别代际流动因果机制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并结合具体的社会制度背景综述了各类家庭资本和家庭行为的影响。

**关键词：**家庭 代际流动 教育获得 教育不平等

## 一、引 言

长久以来，教育分层、教育代际流动等教育不平等研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政策制定者们普遍认为，和学校有关的因素是影响个人教育机会获得、学业成就、教育分层的最主要原因。因此，旨在缩小教育不平等的政策都围绕学校这一教育活动发生的主要场所做文章。但是，1966 年的《科尔曼报告》改变了政策制定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该报告发现，“社会经济因素

---

\* 本文系 2015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家庭行为对子女教育获得的代际效应研究”（主持人：郑磊，项目编号：15CSH01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家庭行为视角下的教育代际流动机制研究”（主持人：郑磊，项目编号：SKZZB2015012）、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8 年度学科建设综合专项资金资助（主持人：侯玉娜，项目编号：2018QNJ00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代际扶贫’效应研究”（主持人：侯玉娜，项目编号：SWU1709356）的研究成果。感谢匿审专家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

与学业成就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当控制了这些因素的影响之后，学校之间的差异只能解释很小一部分学生学业成就之间的差异”（转引自：Albright & Conley, 2004）。

自从《科尔曼报告》发表之后，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开始关注学校以外的其他影响个人教育获得和学业成就的因素，比如学校与社区的互动关系，家庭对个人教育获得的影响等（Albright & Conley, 2004）。事实上，在所有能获得数据的国家或地区，都可以发现子女的学业成就、教育获得与父母的教育水平以及其他与父母教育有关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指标高度正相关，即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效应（Björklund & Salvanes, 2011）。

本文综述近年来有关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效应研究，涉及教育的代际流动、家庭与子女教育获得和学业成就差异的关系等问题。重点关注如下两个内容：第一，家庭对个人教育的代际影响效应有多大？第二，造成这种代际效应的影响机制是怎样的？<sup>①</sup>

## 二、家庭对个人教育的代际影响效应有多大？

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教育政策其实就是围绕学校和学校以外的因素（主要是家庭）究竟谁对学生发展起更大作用而展开的一场争论（Albright & Conley, 2004）。因此，在家庭与教育不平等的关系的研究中，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个人之间在教育获得和教育成就上的差异？特别是相对于学校环境、同伴等其他因素，家庭对个人的教育具有多大的影响？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界定一下：当我们在谈论“家庭”的影响时，到底是在指什么？换言之，“家庭的哪些方面对个人成就起作用、如何起作用以及为何起作用”（Albright & Dalton, 2004: 2）。然后，本文将介绍用于测算家庭影响的代际相关系数和同胞相关系数，最后讨论家庭的作用是否随制度变迁而变化。

---

<sup>①</sup> 本文之所以强调“家庭”而非“家庭背景”，是因为“家庭”的内涵更广。过去的研究在讨论家庭在教育不平等中的作用时，往往只关注父母教育水平、职业地位、收入、户籍等家庭背景变量。这些“标签性”的特征只能反映个人成长的家庭环境，但是并不能进一步分析这些特征对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影响机制。当一个社会不再基于家庭背景而是基于个人的能力来分配教育机会时，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造成不同家庭出身的个人在教育获得和学业表现上的差异的原因来自不同家庭背景下的家庭行为差异。所以，本文用“家庭”这个涵盖家庭背景、家庭行为等含义的概念。

## （一）概念框架

在广义层面上，家庭方面的原因“包括各种不能为个人所选择的因素”（Björklund & Salvanes, 2011: 202），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通过遗传继承的禀赋、基因等，也即文献中所说的“先天遗传因素”（nature）。例如父代通过生物遗传将肤色、身高、长相、智力等特征传递给子代，这其中有些因素可以观测，还有一些因素不可观测或难以观测。二是个人成长于其中的家庭教养环境，也即文献中所说的“后天环境因素”（nurture）。例如，以父母的教育、收入、职业、社会身份、阶层地位等度量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家庭结构。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些不可度量的家庭氛围、生活方式、文化品位等特征。这种后天环境因素以直接的“文化影响”（cultural influences）和间接的地位优势<sup>①</sup>的方式对子女的人力资本产生影响。例如子女对父母的模仿（parent imitation）——子女会因为经常看到父母阅读图书从而意识到读书学习是一件有回报的事情；或者父母有意识的“引导性的教育选择行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其社会经济地位更高，他们既有提高子女教育水平的意识，也有为子女选择良好教育的能力，而且这种选择行为还会因为匹配性婚姻（assortative mating）的影响得到强化（Checchi, 2005）。

之所以存在普遍的人力资本代际传递性，除了先天遗传机制外，也有来自后天教养环境的原因。从教育生产函数的角度来看，个人的教育获得或者教育成就与家长育儿行为（parenting）的投入有关。这种育儿投入包括物质方面和时间上的投入数量和质量（Leibowitz, 1977; Björklund & Salvanes, 2011）。第一，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其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因此更有能力或者更偏好增加对子女物质方面的教育投资，创造更好的后天教养环境，比如为子女选择更好的学校，提供有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课外活动，提供更好的营养健康环境等。第二，父母教育水平较高从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话，母亲更有可能减少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供给，从而增加家庭育儿时间投入（Leibowitz, 1977）。第三，父母教育水平较高的话，将会降低其生育意愿。如果给定父母总的育儿资源投入，当家庭生育子女数量减少时，平均每个子女的育儿物质投入和时间投入会增加。在经济学研究中，这一理论也叫作“子女数量—质量权衡”模型（Becker & Lewis, 1973; Beck & Tomes, 1976）。第四，教

<sup>①</sup> 在凯基（Checchi, 2005: 216）的论述中，他将这里所说的“地位优势”又分为与人力资本投资相关的流动性约束以及和择校相关的基于家庭财富的居住区分割。由于这两种影响机制都与父代的教育水平以及相应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因此本文将其统一归纳为“地位优势”因素。

育水平较高的父母拥有更好的教育理念和育儿技巧，比如增加在家中为孩子阅读的频率，强化家校联系等，这些育儿行为都有助于子女的教育获得和教育成就。第五，由于教育同质性婚姻的趋势，夫妻双方的教育水平比较接近。当父亲教育水平高的时候，母亲教育水平相应也高，这就会产生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外部收益，因为母亲教育水平较高的话将提高其在家庭内部决策中的讨价还价地位。一般说来，母亲更偏好有利于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家庭开支，因此家庭内部和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相关的教育支出将随着母亲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Black & Devereux, 2011）。

综上所述，在影响个人教育成就的家庭背景因素当中，包括了大量可测的（observable）和不可测（unobservable）的因素。我们用下图来表示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影响机制，在这里我们仅仅重点考察家庭背景中一个重要的特征——父代的教育水平——是如何影响子代的教育水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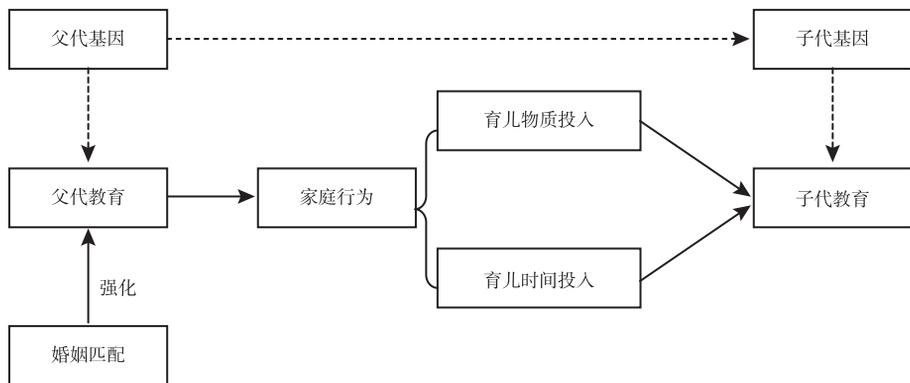


图1 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影响机制

在图1当中，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影响机制包括先天遗传（虚线）和后天环境（实线）两条路径。父代基因通过遗传机制影响子女教育获得；后天教养环境则是各种家庭行为发生的场所。与父母教育以及其他家庭背景特征相关的育儿行为（包括物质投入和时间投入）影响子代教育。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定量研究而言，在每一条影响路径中都有一些可观测因素和不可观测因素。例如在考察先天遗传影响时，基因本身就难以准确测量。随着分子遗传学的进展，很多大型社会调查开始搜集分子遗传的信息，这将推动此类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进展（胡雯等，2012）。在考察后天环境影响时，以父母教育水平、职业地位、收入水平为代表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可以测量的，但是家庭的文化品

位、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偏好等则无法测量或无法准确测量。这就会存在遗漏变量偏误：一方面会低估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影响效应；另一方面也会导致某些特定的家庭因素的影响存在估计偏误。

## （二）教育代际相关系数与同胞相关系数的估算

### 1. 代际相关系数

几乎所有研究数据都发现，父代的教育水平越高，子代的教育水平也越高，这意味着人力资本或教育的代际传递性。例如李云森和齐豪（2011）发现母亲教育水平对子女是否接受10年以上教育具有正的因果关系，但父亲教育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杨娟和何婷婷（2015）发现，父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上大学的概率增加7.75%。林莞娟和张戈（2015）发现，父亲或母亲的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的受教育年限分别增加0.36年和0.59年。

为了准确测量父代教育和子代教育之间的依存关系，很多研究都估算了教育代际相关系数（intergenerational correlations in education）或者教育代际弹性（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 of education）。代际相关系数度量了子代的教育获得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父代的教育获得。在经验研究中通常是用子代受教育年限（对数）对父代受教育年限（对数）进行回归，估计的父代受教育年限（对数）变量的系数就是所谓的教育代际弹性。如果受教育年限（对数）变量的方差在父代和子代之间完全一样的话，那么该弹性就近似等于教育代际相关系数（Solon, 1999）。它表示父代教育水平对子代教育水平的变异的解释程度。

赫兹等人（Hertz et al., 2007）做了一项包含42个国家、跨度长达50年的国际比较。他们发现，拉美国家的教育代际相关系数较高，北欧国家的教育代际相关系数相对较低。平均而言，这种相关系数稳定在0.4左右。比约克隆德和萨尔瓦内斯（Björklund & Salvanes, 2011）对北欧国家以及英国、美国的研究综述发现，教育代际相关系数在0.3—0.46之间。相关系数的平方意味着对因变量变异性的解释比例，换言之，父代教育水平这一单一因素就足以解释子代教育水平变异的9%—21%。陈玉宇等人（Chen et al., 2015）对1930年—1985年出生的中国城市人口的教育代际相关系数进行了估算，发现相关系数在不同年代接受教育的出生队列间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关系。对于改革开放之后接受教育的人群而言，教育代际相关系数为0.381。徐俊武和黄珊（2016）构造的教育代际流动指数也发现中国两代人的教育

获得之间具有类似的随出生队列先降后升的趋势。

在使用代际相关系数时，有几点需要注意。首先，孤立地去解释某一国家某一时期的系数并没有太大意义。这些指标应该放在横向或纵向的对比中去解释。只有这种对比，才能进一步考察宏观的制度变迁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对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接下来的部分进行解释。其次，代际相关系数反映了社会流动性或固化程度，但是并不意味着该系数越小越好。虽然从理论上说，一个等于0的代际相关系数意味着子代的教育获得完全不取决于父代的背景，这是一个充分流动的社会。但是，这恰恰说明劳动力市场等宏观制度存在缺陷——父代的人力资本积累对子代的教育获得没有任何影响，意味着经济学家所声称的人力资本的代际收益不存在，这将影响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Björklund & Salvanes, 2011）。最后，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有必要研究父亲或母亲的教育水平与子代教育水平之间的关联程度有无差异。国内已有研究在估计代际相关系数的时候，大多使用的是父亲的教育水平。这在子女教育获得主要取决于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时期当然没有问题，但是随着婚姻匹配现象的日益凸显，研究者也应当考虑母亲教育水平的作用。从简单的OLS模型也可得知，当存在婚姻匹配的时候，单独用父母一方的教育水平去估算代际相关系数，那么该回归系数其实也包含婚姻匹配这种制度化变迁的效应（Black & Devereux, 2011）。由于母亲会花更多时间育儿，因此母亲教育水平提高将增加育儿时间投入的效率（Haveman & Wolfe, 1995）。但国外同类研究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如果采用双胞胎数据进行差分估计的话，会发现父亲教育水平的作用更大；但如果采用的是工具变量估计的话，会发现母亲教育水平的作用更大（Amin et al., 2015）。国内研究目前对这一问题还缺乏直接的关注。

## 2. 同胞相关系数

尽管很多研究都发现教育代际传递普遍存在，但这并不能有效地回答，相对于其他影响个人教育获得或教育成就的因素而言，家庭的影响程度有多大？换言之，代际相关系数仅仅告诉我们，父代的教育对子代的教育的确会产生影响，但是除了父代教育水平之外的其他家庭因素对子代教育的影响有多大？特别是，包含父代教育水平在内的家庭因素的影响是否在程度上超过了学校环境、社区因素等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家庭之间的差异是否能够解释大部分个人教育水平之间的差异？

我们来看一看通过若干可观测的家庭背景变量来解释教育不平等时，解释力度有多大。李春玲（2003）以父亲的职业、学历、家庭年收入、家庭成分等变量度量

家庭背景对子女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在各个模型中最大的  $R^2$  为 0.179。吴晓刚和特雷曼 (Wu & Treiman, 2004) 以家庭户口状态、父母教育水平、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等指标度量家庭背景对子女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估计的  $R^2$  为 0.356。佐藤宏和李实 (2008) 以家庭成分、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度量家庭背景对男性户主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各个模型中最大的  $R^2$  为 0.191。李春玲 (2009) 以父亲和母亲的教育水平、父亲的职业类别、家庭户口状态和家庭年收入等变量衡量家庭背景对男性和女性教育获得的影响，在各个模型当中最大的  $R^2$  为 0.324。也就是说，在上述这些代表性研究中，利用有限的几个可观测的家庭背景变量去解释个人之间在教育水平上的变异，最多只能解释 35.6%。这似乎意味着：家庭对个人的教育的确有影响，但并非最重要的影响——毕竟还有一大半的变异无法通过家庭背景变量得到解释。但是，梭伦 (Solon, 1999) 指出，在大量有关家庭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中，利用有限的、可观测的家庭背景变量去度量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往往会得到一个很小的  $R^2$ ，这就会低估家庭的真实影响。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家庭对教育不平等的解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学校、社区和同伴对个人的教育有影响，但这些因素其实都是家庭选择的结果。因此仅仅使用家庭背景变量去考察家庭的真实作用，就会遗漏家庭的很多直接或间接效应。

为了更全面地评价家庭的作用，国外的相关研究使用同胞教育相关系数 (sibling correlations in education) 这一指标。它度量了同胞之间共同的家庭因素对个人之间在教育变异上的贡献份额 (Solon, 1999; Björklund & Salvanes, 2011)。该系数反映了各种可度量和不可度量的家庭特征的影响，所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度量家庭影响的粗略指标。之所以是“综合性”，是因为它包含了不可度量的家庭特征的影响；之所以是“粗略”，是因为它没有完全涵盖家庭的所有影响 (Solon, 1999)，因为一些同胞之间的非共有家庭因素并未包含在该指标中，例如父母对家中不同子女的育儿行为可能并不一样。<sup>①</sup>

相对于仅仅用父母教育水平、职业地位、家庭收入等有限的、可观测的家庭背景变量做回归，利用同胞相关系数去估计家庭对教育不平等的贡献份额会更大，因为后者还包括了一些不可观测的家庭背景因素 (Solon, 1999)。根据比约克隆德和

<sup>①</sup> 教育代际相关系数与同胞教育相关系数的关系在于，同胞相关系数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代际相关系数的平方；二是和父代教育无关的一个影响因素 (Solon, 1999)。因此，同胞相关系数度量的家庭的影响在涵盖范围上要大于代际相关系数，代际相关系数会低估个人教育对家庭的依赖程度。

萨尔瓦内斯 (Björklund & Salvanes, 2011) 的综述, 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同胞教育相关系数一般在 0.4—0.6 之间。这意味着个人之间受教育水平的差异有 40%—60% 归因于家庭因素, 如果再考虑到同胞之间非共有的一些家庭因素的影响, 那么家庭对个人教育的影响程度在各种影响因素当中是相对较大的。也就是说, 个人之间在教育获得上的变异, 有一半左右的原因来自家庭之间的差异。有意思的是, 康利和格劳伯 (Conley & Glauber, 2008) 通过计算同胞之间在教育、收入等多个社会经济结果指标上的相关系数后发现, 家庭对来自弱势群体的个人的影响相对较小。

### (三) 制度变迁是否会改变家庭的影响?

在代际流动的研究领域, 社会学家特别关注宏观的制度变迁是否会影响流动和分层模式。有关中国的研究主要关注在一些特定的历史事件背景下——诸如“文革”、社会的市场化转型、教育扩展等, 家庭怎样影响个人的教育分层和流动。

#### 1. 政治制度变迁过程中家庭背景的影响

很多学者都研究了“文革”这一重要的政治制度变迁对中国教育不平等的影响。邓忠和特雷曼 (Deng & Treiman, 1997) 的研究是其中的代表性文献。他们利用 1982 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现, “文革”期间去分层化的意识形态有效地缩小了教育获得上的阶层差异, 家庭背景的影响不再重要, 甚至出现逆转。出身于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知识分子家庭或干部家庭 (对子女入学) 的优势在“文革”期间不复重要, 但“文革”之后马上又显现出来。周雪光等人 (Zhou et al., 1998) 利用 1993—1994 年 20 个城市居民数据的研究发现, 在“文革”期间, 家庭背景对来自“剥削阶级”或中产阶级的子女进入高中或大学并无影响, 但在“文革”之后具有明显的作用。刘精明 (1999) 发现, “文革”只是在前期对高中教育的获得模式产生了严重影响, 到了后期, 各阶段教育的获得模式都恢复到“文革”之前的代际传递路径。面对“文革”的冲击, 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或者努力抗拒这种冲击, 或者利用这种冲击所造成的混乱, 通过权力因素延续着教育获得模式中的代际影响。周雪光和侯立仁 (Zhou & Hou, 1999) 同样发现, “文革”期间的知识青年“下放”政策对所有社会群体都造成了不利影响, 但是官僚阶级有能力采取措施降低这种不利影响。

这些研究表明, 在政治制度变迁过程中, 以去分层化的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教育政策可以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促进教育公平, 但是教育的代际流动模式具有自

己的路径依赖特征，优势阶层出身的群体会采取各种方式抵制外部政策的冲击，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激进的教育公平政策可能未必具有长期的有效影响。

## 2. 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背景的影响

市场化转型所带来的机会均等有可能会促进教育的代际流动，但与此同时，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同样可能导致之前的优势阶层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具有更多的教育机会和更强的教育回报。李春玲（2003）发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国教育分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教育机会分配趋向公平，家庭背景不再重要；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家庭背景以及制度因素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越来越大。类似的研究还有李煜（2006）、刘志明和高耀（2011）等。

为了更好地解释家庭的作用如何随市场化转型而变化，刘精明（2008）区分了不同家庭背景对子女基础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将其分为内生性家庭资源和外依性家庭资源。内生性家庭资源系指“一个家庭一经组成便自然固有的人口结构方式，以及内化于家庭成员之中的知性与情感体系……典型的包括家庭结构以及家庭文化资本”，因为较少受到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从而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是持久、稳定且增长的。而外依性家庭资源系指儿童成长过程中与家庭物质资源相关的养育环境，而这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劳动力供给等外部因素，因此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会因为教育扩展或其他平等化的社会政策的作用而趋于下降。

## 3. 教育扩张中家庭的影响

教育扩张虽然有可能缩小教育获得数量上的不平等，但却无助于减少教育获得质量上的差异。郝大海（2007）利用2003年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发现，改革开放前以公平为导向的“去分层化”政策抑制了较高阶层，特别是专业技术阶层的教育需求，从而缩小了教育不平等。但是转型之后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逐渐体现，较高阶层子女在升高中和升大学的过程中具有优势。刘精明（2006）和李春玲（2010）同样发现，扩招并未改变教育分层的状况。虽然扩招在总体上扩大了各个阶层的入学机会，但是优势阶层更多集中在地位取向明确的本科层次教育，而下层群众则更多从生存取向明确的成人高等教育普及中获益。对于高校扩招之后城乡教育机会差距为何没有缩小这一现象，很多研究指出，这是因为在中考阶段就存在着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Li et al., 2015；李春玲，2014；吴愈晓，2013）。

吴晓刚（Wu, 2010）的研究同样证实，基础教育领域的扩展并未改变教育分层结构。他利用中国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发现，以父母教育水平、家庭社

会经济地位指数、户籍状况衡量的家庭背景对个人的入学和教育转换发挥着持续且重要的影响。尽管义务教育普及缩小了初中升学率的城乡差距，但是新的入学机会不平等出现在了高中入学机会上，并且受父亲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在加强。

这些研究表明，教育分层和代际流动模式表现出一种稳定的特征，当激进的基于家庭出身分配教育机会的制度结束之后，如果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个人仍然在教育获得上存在差异，这很可能是因为不同类型家庭内部的行为差异所致。或者说，与家庭背景相关的家庭行为持续性地影响了子代的教育获得。因此另一种理解代际流动的视角，就集中于考察家庭行为、决策等微观过程（Esping - Andersen, 2004: 293, 307）。这也是近年来有关教育获得研究的重点——关注各类家庭资本通过哪些微观的中介机制或行为影响教育获得。对此，我们将在第三部分详细讨论。

### 三、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影响机制

在家庭与教育不平等的关系的研究中，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从家庭的视角来看，教育代际流动的机制是怎样的？相应的政策干预措施有哪些？这也是代际流动研究近十年来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Björklund & Salvanes, 2011）。我们首先介绍学术界长久存在的“先天—后天”之争，然后讨论后天教养环境中各类家庭资本的作用，最后谈一谈与家庭人口结构有关的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

#### （一）先天遗传还是后天教养更重要？

基于前述教育代际流动的理论框架，学者们进一步想知道：对个人教育获得和教育成就而言，先天遗传因素和后天家庭教养环境究竟谁的影响更大（Björklund & Salvanes, 2011）？区分遗传（genetic）和环境（environment）各自对教育代际流动的贡献至关重要。首先，这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前沿问题。对“先天—后天”的争论是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共同关注的一个持久性的热门话题。其次，这一争论与公共政策和实践问题直接相关。如果我们发现，影响个人教育的家庭因素主要来自后天的家庭教养环境，那么旨在缓解家庭预算约束、提高父母育儿技巧的公共政策就有助于促进教育的代际流动。但是如果教育代际传递的主要原因是先天遗传所致，或者说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自然选择，那么公共政策的干预空间就很有限（Black &

Devereux, 2011; Sacerdote, 2002)。

那么，如何识别教育代际流动的机制呢？用专业术语来说，学者们希望识别代际教育相关关系是否是一种因果关系。很多国家的研究都发现，父代的教育水平越高，子代的教育水平也越高，也即教育代际相关系数是正的并且在绝对值上较大。一种可能是因为受过良好的教育会让父母更有能力为子女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成长环境，从而在后天有助于子女的教育获得，这就是计量经济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causation)。但是，教育代际弹性或教育代际相关系数是通过子代教育水平对父代教育水平的回归估计得到的。如上文图中图 1 所示，由于我们遗漏了不可观测的父代的禀赋或能力因素，这些遗漏变量既影响父代的教育水平，也影响子代的教育水平，从而导致 OLS 估计的结果是有偏的。因此即使我们发现父代教育水平变量系数显著为正，我们也难以将其识别为因果关系。更通俗地说，我们观察到教育水平较高的父母养育的孩子往往教育水平也较高，这可能是因为这些父母在很多遗传基因、禀赋上具有优势，这些先天因素遗传给了子女，因此这就是一种纯粹的自然选择 (pure selection) (Black et al., 2005a)。用中国的俗语来说，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为了尽可能准确地识别出父代教育水平与子代教育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是否是一种因果关系，经济学家主要采取了三种方法：以来自父亲（或母亲）是双胞胎的子女样本进行研究 (twins as parents)，以父母的亲生子女和领养子女的样本进行研究 (adopted children)，寻找一个外生于父母能力但又与父代教育水平相关的工具变量 (Black et al., 2005a; Björklund & Salvanes, 2011)。由于领养子女样本在国内很难找到，因此我们介绍其他两种方法。

基于双胞胎样本的研究思路是：子代的教育水平取决于父亲（或母亲）的教育水平，父亲（或母亲）拥有的与子女教育相关的禀赋特征（既包括可测的也包括不可测的）对于来自同一对双胞胎的个体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找到父亲（或母亲）是双胞胎的子女样本，那么进行一个差分估计，就能消除那些不可观测特征造成的估计偏误 (Black & Devereux, 2011)。这方面最早的代表性研究来自贝尔曼和罗森茨魏希 (Behrman & Rosenzweig, 2002)，但是他们发现母亲教育水平的提高无助于提高子女的教育获得。然而，该方法不仅对样本要求比较高，同时也强加了非常强的假设前提——双胞胎之间不仅在基因上完全一样，在后天习得的育儿理念、行为等与子女教育有关的禀赋特征上也一样 (Black & Devereux, 2011)。正如本文

最后一部分综述的内容所证明的：事实上，在一个多子女家庭当中，父母对待不同子女的偏好和行为可能是不一样的。

另一个更为使用的方法是工具变量估计。其基本思路是：利用一个外生于模型的“冲击”——例如教育法规的制定、社会事件的影响等，作为内生的父代教育水平的工具变量。由于这些外生冲击完全独立于模型，因此它与被忽略的父代的能力因素不相关，从而可以得出更加准确的父代和子代教育水平之间的关系。

布莱克等人（Black et al. , 2005a）以受教育年限作为度量教育水平的指标，利用挪威1960年到1972年间实施的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义务教育法改革作为一个外生的工具变量。他们的估计显示，尽管OLS回归估计得到的父亲（或母亲）与儿子（或女儿）的教育代际弹性很大，但是工具变量估计并没有发现父亲和儿子（或女儿）之间以及母亲与女儿之间的教育水平存在因果关系，唯一的例外是母亲和儿子之间的教育水平的确是一种因果关系。换言之，先天遗传是教育代际传递的主导因素。但是更多的研究则发现了相反的结论。奥列奥普洛斯等人（Oreopoulos et al. , 2006）利用美国历次义务教育法改革作为工具变量，发现父母任何一方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复读的概率会下降2%—4%。莫林和麦克纳利（Maurin & McNally, 2008）利用了一个有趣的外生事件作为父母教育水平的工具变量。1968年5月法国爆发的学生骚乱很快蔓延全国，因此正常的入学考试被终止，各类教育的通过率都显著提高，结果导致那一代学生当中有不少人的受教育水平都较其他出生队列的同龄人要高。他们发现，那些因为骚乱放宽入学标准从而获得更高教育年限的人群不仅自身在将来获得了更高的收入和职业地位，还将这种教育外部性传递给下一代——他们的子女的复读率也显著地下降。李云森和齐豪（2011）利用20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地区基础教育普及政策作为父母教育水平的工具变量，结果发现母亲教育水平对子女是否接受10年以上教育具有正的因果关系，而父亲教育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杨娟和何婷婷（2015）利用“文革”事件对一代人受教育水平的冲击作为工具变量，发现父亲受教育年限增加1年，子女上大学的可能性增加7.75%。林莞娟和张戈（2015）利用1978—1982年我国延长中小学年限的学制改革作为工具变量，发现父母教育水平对子女教育水平具有显著的因果关系。

在识别教育代际流动的因果关系时，虽然工具变量方法用得较多，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一个符合要求的工具变量很难寻找。尽管随着国内数据搜集工作的不断推进，假以时日的話，1986年实行的《义务教育法》以及1999年开始的

高校扩招都可以作为中国研究的工具变量，但是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很容易受到质疑。有研究者指出，已有研究选取的工具变量看似不直接影响子代的教育，但其实不然（Black & Devereux, 2011）。以高校扩招这一工具变量为例，为了应对扩招之后的人才培养质量下降问题，我国采取了很多同步的措施，例如强化本科教学质量评估、提高教师队伍质量等，而这些因素也直接影响到子代的教育获得，因此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无法得到满足。其次，工具变量估计的效应是一种局部平均处理效应（LATE），它其实反映的只是总体当中一部分会受到该工具变量影响的样本的代际效应，难以反映整个总体中的代际流动关系（Black & Devereux, 2011）。

## （二）后天环境中各类家庭资本与家庭行为的作用

既然后天的教养环境很重要，那么是哪些家庭资本以及家庭行为影响了教育的代际流动？对此，社会学和经济学有不同的视角。

### 1. 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父母参与的作用

社会学强调物质财富以外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教育代际传递中的作用（Bourdieu, 1986; Coleman, 1988; De Graaf, 1988）。教育水平高的父母，往往有更好的文化资本，这意味着更好的教育理念、更适于学习的家庭氛围。家庭藏书量是物化的（objectified）文化资本。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简称 PISA）等国际学生能力测试的研究结果发现，不论在哪个国家，家庭藏书量都和学生学业成就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othstein, 2010）。在美国，以英语为母语的儿童和双语家庭儿童的语言能力差距有一部分可以归因于前者的家庭图书资源更加丰富（Feng et al., 2014）。即使不用家庭藏书量这一指标，仅仅使用“家庭是否拥有一部百科全书”这一变量，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儿童的语言识字测试得分。因为虽然儿童不太可能去阅读家中的百科全书，但拥有这类藏书意味着父母的教育水平较高，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对儿童教育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模仿效应（Leibowitz, 1977）。

随着研究的深入，文化资本的概念不仅包括家庭开展的高阶文化活动，还包括父母的育儿理念和行为（Roksa & Potter, 2011）。很多研究发现，育儿理念因父母教育水平不同存在着显著的阶层差异。针对美国白人家庭和黑人家庭 10 岁儿童的家庭生活的研究发现，在父母的育儿方式上，种族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但是社会阶级之间的差异却很显著。具体而言，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关注的是如何“教”

(cultivation), 父母投入大量精力, 通过有组织的闲暇时间活动培养子女的天赋。而工人家庭和贫困家庭的父母关注的则是如何“养”(natural growth), 父母只提供让子女能够成长的必备条件, 至于闲暇时间如何安排全部交由子女自己处理(Lareau, 2002)。新近的研究则表明, 父母育儿理念和行为的差异不仅与父母当前的阶层地位有关, 也与父母自身的家庭出身有关。换言之, 文化资本在教育代际流动中的作用不仅发生在家庭内部儿童成长的童年时期, 也发生在为人父母的整个生命周期, 这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文化流动(cultural mobility)的假说(Roksa & Potter, 2011)。这对于出身于低阶层家庭的父母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自致的地位获得改变自己的教育理念和行为, 从而促进下一代的教育流动。

教育水平高的父母也更有时间且更愿意花时间陪伴子女。这种育儿时间投入在科尔曼(Coleman, 1988)的研究中叫作“社会闭合”意义上的社会资本。与之相近的是“父母参与”这一概念, 具体包括父母在家中辅导或监督子女的作业、了解学校的情况、带子女参加各类文体活动, 以及在家庭以外与子女学校和教师的交流等。因此有学者关注父母育儿时间投入(Guryan et al., 2008)、家庭阅读频率(Kloosterman et al., 2011)、家长参与和家校合作交流(McNeal, 1999)等需要花费父母时间投入的行为的影响。很多研究都发现, 父母的育儿方式都和父母的教育水平相关。

莱博维茨(Leibowitz, 1977)对美国3—5岁儿童的研究发现, 家庭是否拥有洗碗机、烘干机和儿童的看图识字测试得分正相关。这意味着洗碗机、烘干机虽然也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一种体现, 但其对儿童教育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它们是一种可以节约劳动时间的设备(同样体现家庭经济收入但是无法节约劳动时间的电视机、家庭音响设备对儿童识字得分并无影响), 从而让父母可以投入更多时间用于育儿。研究者进一步发现, 育儿时间的投入数量和投入质量都与父母的教育程度有关。一般说来, 母亲陪伴子女的时间远远多于父亲, 如果父母教育程度的影响仅仅体现家庭的遗传基因或社会经济地位, 而与育儿时间投入无关的话, 那么父亲和母亲教育水平对儿童识字得分的影响应该是类似的。然而研究发现, 母亲教育程度对识字得分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而父亲教育程度并无显著影响。这就意味着母亲教育程度不仅体现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更体现了一种育儿时间投入数量。进一步区分母亲的育儿时间时发现, 母亲与子女阅读、母亲自己阅读都对儿童识字得分具有正效应, 并且前者的影响是显著的, 而母亲陪儿童看电视或者母亲自己看电视则具有负效应。

针对中国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受到家庭经济、儿童自身健康等因素的影响，上学年龄推迟并不鲜见，这会对儿童的终身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李宏彬等人（Li et al. , 2005）以儿童上学年龄作为衡量教育获得的因变量，考察了父母育儿时间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母亲育儿时间投入越多，儿童上学的年龄就越早。一旦控制了母亲育儿时间，儿童健康状况对入学年龄并不具有显著的影响。这意味着母亲教育水平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机制主要是通过母亲增加育儿时间从而有助于提高儿童健康实现的。

父母一个重要的有益于子女教育发展的行为就是家庭阅读。几乎所有研究都表明，父母在家庭中和孩子的阅读频率越多，对儿童的教育发展就越有益。父母如果在家庭中给4—5岁的孩子阅读的话，将显著提高孩子的阅读技能和包括运算能力在内的认知技能，并且这种技能培养优势会至少保持到10—11岁（Kalb & Van Ours, 2014）。冯等人（Feng et al. , 2014）对美国以英语为母语的儿童和双语家庭儿童的研究发现，父母在儿童早期成长阶段是否经常给孩子读书是一个重要的预测其未来语言能力的指标，其作用超过了给孩子讲故事和唱歌。

有关父母参与和家校联系对子女教育发展的影响的研究是国内这几个年的一个热点话题。很多研究发现，父母在家庭内部监督子女作业、与子女讨论学校情况，在家庭外部进行家校联系等时间投入，对子女的学业表现具有积极的影响（Carbonaro, 1998；Pong, 1998；赵延东、洪岩璧, 2012；黄亮, 2016；朱钰淇等, 2017；梁文艳等, 2018；杨中超, 2018）。但也有研究发现，这些父母参与行为对西部农村家庭的子女学业表现并无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基于国外研究概念化的“父母参与”度量指标并没有准确度量中国农村地区父母真实的教育参与情况，这也是未来国内研究应该关注的一个方向（李晓晗、郑磊, 2016）。

随着两性社会分工的变化，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男性也不只是负责为家庭挣钱，同时也承担了一些直接的育儿责任。因此在有关父母育儿和子女教育参与的研究方面，国外开始讨论父亲参与（fatherhood）的影响（Carlson & Van Orman, 2017；Kalil et al. , 2016；Lindberg et al. , 2017）。国内的研究尚未关注这一问题，这也是今后一个可能的研究方向。

## 2. 经济资本与预算约束的影响

教育水平高的父母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面临的预算约束较小，能够提供更好的教育投资和选择。因此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资本是教育代际传递的关键因素，

“父母教育—家庭收入—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子女教育”是教育代际传递的机制 (Becker & Tomes, 1979)。卡尔内鲁和赫克曼 (Carneiro & Heckman, 2002) 修正了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 认为家庭经济资本起着重要作用, 并且“钱”的真正作用在于长期效应。贫困家庭并非因为在高中或大学教育转换阶段无力支付学费 (也即短期的借贷约束) 限制了子女的教育获得, 而是因为无法为子女提供高质量的家庭环境, 特别是早期成长阶段的各种干预措施, 这将极大地影响子女的能力发展。

赫克曼等学者近年来集中讨论了早期/学前发展干预措施对青少年时期教育获得和学业表现的影响。在他们看来, 社会经济地位弱势家庭在婴幼儿成长的早期阶段, 因为经济资本的匮乏, 没有为子女提供充足高质的营养、健康和教育投资, 而这一阶段是个人认知能力发展的关键期和敏感期。因此, 家庭经济资本对子女教育获得和成就的影响是一种长期的、累积的作用。他们利用经济学的人力资本投资等概念, 构建了一个“能力形成的动态模型”。该理论强调人的能力是一个不断累积的多阶段过程, 具有两大特点: 自我生产——之前形成的能力能够促进之后阶段能力的发展; 动态互补性——在某一阶段对能力进行干预或投资, 其生产效率取决于之前已经获得的能力 (Heckman, 2006, 2007; Cunha & Heckman, 2007)。

近年来, 经济学家关注收入不平等与代际流动的关系, 这对经济资本在教育代际传递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是科拉克 (Corak, 2013) 提出的“盖茨比曲线” (The Great Gatsby Curve) ——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的国家, 代际收入弹性也越大。换言之, 不平等伴随着代际固化。父辈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越明显, 意味着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差距越大。在美国,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21 世纪初, 最低收入分位组家庭用于子女教育有关的支出从每个孩子 835 美元增长到 1315 美元。而最高收入分位组家庭的支出从 3536 美元增长到 8872 美元。富裕家庭子女的教育机会因此比贫困家庭子女多出很多。与此同时, 在劳动力市场上, 高等教育的回报率也在不断上升, 从而贫富家庭子女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因此, 盖茨比曲线背后的机制是: “收入分配不平等—人力资本投资差距—高等教育回报率上升—代际收入固化”。

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检验了父代收入分配差距与子代教育获得、学业表现的关系。坎贝尔等人 (Campbell et al., 2005) 发现, 美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与之相伴的是, 白人学生的教育获得在增加, 但黑人学生的教育获得几乎不变。里尔登 (Reardon, 2011) 对美国的研究发现, 过去 25 年里, 随

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孩子在学业表现上的差距也有所扩大。范等人（Fan et al., 2015）对中国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盖茨比曲线”：父代教育年限的离散程度越大，代际教育流动性越低。然而，也有研究指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健（Bloome, 2015）。因此，对于收入不平等与代际流动的关系需要结合具体社会的制度来分析。比如梅尔（Mayer, 2002）指出，在美国，收入不平等加剧了居住空间上的地理分隔。美国基础教育入学和教育经费投入采取的是“学区制”，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理论猜想去解释收入不平等、分隔与贫困家庭子女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但预测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而范等人（Fan et al., 2015）指出，中国的“盖茨比曲线”是因为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和教育成本不断上升，以及分权化的政府教育经费投入等制度化因素所致。

如果家庭经济资本或者说父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面临的预算约束的作用更大，那么旨在缓解家庭预算约束的公共教育支出政策或者税收政策就有可能促进教育代际流动。这一具有政策启示的推测被不少实证研究所证实。梅尔和洛波（Mayer & Lopoo, 2008）发现，在美国那些公共教育支出更高的州，代际流动性也越高。艾泽尔（Aizer, 2014）利用 25 个 OECD 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增加公共卫生支出可以显著地降低家庭在子女人力资本投资上的影响，缩小子女 PISA 测试成绩的差异。此外，增加公共住房支出、教育支出等公共政策也具有类似的但是程度稍小的作用。孙志军（2011）发现，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可以减少家庭背景对个人受教育机会和学业表现的影响。针对中国的研究也发现（Li et al., 2014, 杨娟、周菁, 2013; 李力行、周广肃, 2014; 刘楠楠、段义德, 2017），增加公共教育支出从长期来看可以增加贫困家庭的受教育水平，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

既然时间投入和物质投入都是父母影响子女教育的两种投入方式，那么，父母是否会用其中一种投入替代另一种投入呢？针对中国西部农村地区的研究发现，随着农村外出打工人口的增加，父母没有时间在家陪伴子女，因此普遍存在着以打工挣得的物质投入替代时间投入的现象（Kong, 2008）。但也有研究发现，无论在中国西部农村还是中东部农村，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在儿童教育投资决策时，并没有用物质资源投入去替代时间资源投入，而是在两方面都投入得比较多（Brown, 2006; 祁翔, 2013）。

### 3. 各类资本的作用的比较

那么，到底是与家庭经济资本相关的物质投入的作用大，还是与家庭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相关的非物质投入作用更大呢？加格和霍尔姆（Jæger & Holm, 2007）

对丹麦的研究发现，家庭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获得的预测作用要大于经济资本。郭丛斌和闵维方（2006）发现，对于子女能否接受高等教育而言，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要大于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刘嵩然和谢宇（Liu & Xie, 2015）发现，尽管家庭收入与子女的认知能力（以词汇能力来度量）显著相关，但是家庭的非货币性资源——特别是父母的育儿方式——的影响更大。

近年来经济史学家提出的一种新的方法——姓氏分析方法——表明，传统的基于两代人调查数据估算的代际传递性可能偏低。郝煜（2013）利用该方法，对中国社会从1645年到2010年的长期社会流动性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949年之前中国社会的代际传递性（ $\beta$ 值，用家族出现的中举者或大学生数量衡量）在0.78以上，1950—2010年的代际传递性也保持在0.63—0.74之间。英国（用遗产衡量代际传递性）、瑞典（用教育水平衡量代际传递性）、美国（用家族的律师数量衡量代际传递性）、日本（用教育水平衡量代际传递性）、印度（用家族的医生数量衡量代际传递性）等其他采用类似方法的国家，同样发现了较高的代际传递性（ $\beta$ 值在0.61—0.91之间）。这些 $\beta$ 值高于传统方法所估计的结果。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历史上出现的一些激进的再分配政策并没有有效降低代际传递性。

和该研究对应的是，对“文革”事件对中国社会代际流动的影响的研究发现，尽管在激进的年代去分层化的意识形态有效地缩小了教育获得上的阶层差异，家庭背景的影响不再重要甚至逆转，但是一旦激进的政治制度变迁结束之后，优势家庭在教育代际传递上的优势立即显现出来（Deng & Treiman, 1997; Zhou et al., 1998; 佐藤宏、李实, 2008）。这说明以去分层化的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教育政策可以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促进教育公平，但是教育的代际流动模式具有自己的路径依赖特征。由于家庭拥有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受到政策冲击的影响较小，更容易“世袭”，因此对教育的代际传递发挥着持续的、隐蔽的作用，其作用也大于物质资本（郝煜, 2013）。

### （三）家庭人口结构、家内资源分配与子女的教育获得

家庭之间因为父母的教育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的不同，会拥有不同的禀赋、资本以及教养行为，不管通过先天的遗传路径还是后天的教养环境，都会影响到子代之间在教育获得和教育成就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来自家庭之间，也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综述的内容。但是即使在同一个家庭内部，当父母生育有多个子女的时候，同胞之间的教育可能也存在差异，这是一种来自家庭内部的差异。

前面说过，尽管同胞相关系数是一个涵盖范围很广的、反映家庭和社区环境影响的指标，但是因为同胞相关系数忽视了很多家庭环境当中非同胞共有的因素，因此仍然难以全面度量家庭的影响（Solon, 1999）。这其中一个重要的遗漏因素就是父母可能会在同胞之间采取不同的教养方式，比如父母对不同子女的教育期望不一样，在家庭内部资源分配过程中有所偏向等。这其中尤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子女的性别不同而产生的家庭内部的不平等（inequality within family）。比如李春玲（2003, 2009）发现，家庭背景对女性的教育获得影响更大。

康利（Conley, 2005）的一项研究发现，来自同一家庭的同胞之间在社会地位、财富、教育成就上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在各种造成经济、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当中，有3/4的因素来自家庭内部（within family）而非家庭之间（between families）。基于此，康利提出了“啄序”（pecking order）的概念，他认为这种家庭内部的因素主要是家庭内部父母与子女、同胞之间的人际互动关系。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基于家庭内部的人际互动来研究家庭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这也是此类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在这一研究主题上，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从各自的学科视角提出了不同的理论。经济学将这种家庭内部的人际互动看作一种资源约束下的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模式，社会学和心理学则将这种人际互动看成家庭社会化过程。这种家庭内部的互动关系都取决于家庭的人口结构（family configuration）——特别是同胞规模（sibship size）、同胞性别结构（sex composition of sibling）、出生顺序（birth order）、出生间隔（birth spacing）等。

这其中，考察同胞规模的影响的研究最多。研究发现，同胞规模既影响到家庭中每个子女所接受的先天遗传效果，同时也关系到后天的家庭教养环境。对此，资源稀释理论（resources dilution model）和群集理论（confluence theory，也叫作融合模型）给出了不同的解释（Chu et al., 2007）。按照资源稀释理论的解释，家庭可供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资源是有限的，家庭规模越大，每个子女的平均投资数量就会减少，从而人力资本投资质量也会下降。贝克尔等人（Becker & Lewis, 1973; Becker & Tomes, 1976）提出的子女数量—质量权衡理论（quantity-quality tradeoff）与此基本类似，也是后来经济学家对此问题进行分析的重要理论基础。而群集理论则认为，家庭中某个孩子所面对智力遗传环境与同胞数量以及自己的排行直接相关，父母生育数量越多，会导致其所处的平均智力质量下降，从而不利于教育发展。和理论预测的一致的是，大量经验研究表明，同胞规模的确和个人成就

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osenzweig & Wolpin, 1980; Hanushek, 1992; Black et al., 2005b; Åslund & Grönqvist, 2010; Li et al., 2008; De Haan, 2010; Silles, 2010; 罗凯、周黎安, 2010; 郑磊等, 2014）。

尽管同胞规模和教育等社会经济成果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广泛存在，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别的家庭结构特征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这其中重点关注的两个因素就是出生间隔和同胞性别结构。结合经济学有关父母在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目标以及不同社会的性别偏好文化，可以得出不同的预测。比如说，在给定的家庭生育规模下，同胞之间出生间隔越小，对人力资本投资资源的竞争就越大，越有可能对相对年长的女孩的教育获得产生不利影响。同样，在给定的家庭生育规模下，如果同胞之间男孩越多，那么在有着强烈男孩偏好的社会里，并且父母在分配资源时的目标是最大化未来家庭的总财富，那么就会倾向于给男孩多投资，这就不利于女孩的教育获得。但是如果父母在分配资源时是为了平衡子女之间未来的福利，那么就会对相对“弱势”的孩子多投入资源，因此女孩的教育投资可能会更多（Powell & Steelman, 1990; Steelman et al., 2002; 李宏彬、张俊森, 2008; 郑磊, 2013）。

#### 四、小 结

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影响效应是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通过对不同学科研究的回顾，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首先，在众多影响个人教育获得或教育成就的因素中，家庭是一个相对更重要的因素。已有研究大多采用父母的教育水平、职业地位、家庭收入、政治身份、户籍状态等变量度量家庭背景的影响，均发现这些因素对个人教育获得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是考虑到家庭的影响还包括很多量化研究无法准确度量或直接度量的因素，因此已有研究在评价家庭的作用时存在低估。

其次，尽管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影响同时具有先天遗传和后天教养环境两方面的作用，但是更多的研究认为，后天环境的作用更大一些。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公共政策改变或影响家庭在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的环境，从而促进代际流动。

再次，在家庭的教养环境当中，父母对子女的物质投入和时间投入都很重要。前者和家庭拥有的物质资本有关，后者则体现为一种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学研究更强调物质投入的重要性，因此增加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支出就可以缓解家庭在人力资本投资时的预算约束，从而促进代际流动。社会学研究更强调隐蔽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从一些较长历史跨度的研究来看，一个社会的代际流动保持着稳定的模式。这意味着即使采取激进的制度变迁，可能无法有效地改变代际传递的路径依赖。但是，仍然可以通过父母亲的带薪产假或育儿休假等公共政策，影响父母的育儿行为，从而促进代际流动。

最后，即使在同一个家庭内部，父母对待不同子女的偏好和行为也不同。因此教育不平等的原因不仅来自家庭之间的差异，也来自家庭内部。

#### 参考文献：

- 郭丛斌、闵维方，2006，《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高等教育研究》第11期。
- 郝大海，2007，《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1949—2003）》，《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郝煜，2013，《中国的长期社会流动性，1645—2010：姓氏方法》，《经济资料译丛》第2期。
- 胡雯、张浩、李毅、刘世定、国光，2012，《分子遗传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影响》，《社会学研究》第5期。
- 黄亮，2016，《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对初中生认知能力表现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基线数据的分析》，《教育科学研究》第12期。
- 李春玲，2003，《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2009，《教育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家庭背景对男性和女性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妇女研究论丛》第1期。
- ，2010，《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察》，《社会学研究》第3期。
- ，2014，《教育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1940—2010）——对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再考察》，《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李宏彬、张俊森，2008，《同胞性别构成对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中国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力行、周广肃，2014，《家庭借贷约束、公共教育支出与社会流动性》，《经济学》（季刊）第1期。
- 李晓晗、郑磊，2016，《社会资本起作用吗？——农村家庭的代际闭合与儿童学业表现》，《教育学报》第3期。
- 李煜，2006，《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李云森、齐豪，2011，《中国农村教育的代际因果关系——基于1970年代农村基础教育普及政策的研究》，

《世界经济文汇》第4期。

- 梁文艳、孙冉、叶晓梅, 2018, 《核心素养视角下父母参与如何影响儿童的学业发展? ——基于城乡户籍和区域流动状况的差异分析》, 《教育经济评论》第3期。
- 林莞娟、张戈, 2015, 《教育的代际流动: 来自中国学制改革的证据》,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刘精明, 1999, 《“文革”事件对入学、升学模式的影响》, 《社会学研究》第6期。
- , 2006, 《高等教育扩展与入学机会差异: 1978 - 2003》, 《社会》第3期。
- , 2008, 《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中的机会不平等及其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 刘楠楠、段义德, 2017, 《财政支出对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 《财经科学》第9期。
- 刘志明、高耀, 2011, 《家庭资本、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获得——基于江苏省的经验研究》, 《高等教育研究》第12期。
- 罗凯、周黎安, 2010, 《子女出生顺序和性别差异对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一个基于家庭经济视角的分析》, 《经济科学》第3期。
- 祁翔, 2013, 《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子女人力资本投资——来自中国农村家庭的调查研究》, 《教育学术月刊》第9期。
- 孙志军, 2011, 《家庭背景、公共教育支出高中阶段教育入学机会》,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第1期。
- 吴愈晓, 2013, 《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及其演变(1978—2008)》, 《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徐俊武、黄珊, 2016, 《中国代际教育流动性的地区、城乡与阶层差异研究》, 《统计与决策》第8期。
- 杨娟、何婷婷, 2015, 《教育的代际流动性》, 《世界经济文汇》第3期。
- 杨娟、周青, 2013, 《增加公共教育经费有助于改善教育的代际流动性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杨中超, 2018, 《家庭背景与学生发展: 父母参与和自我教育期望的中介作用》, 《教育经济评论》第3期。
- 赵延东、洪岩壁, 2012, 《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网络资源与社会闭合的视角》, 《社会学研究》第5期。
- 郑磊、侯玉娜、刘叶, 2014, 《家庭规模与儿童教育发展的关系研究》, 《教育研究》第4期。
- 郑磊, 2013, 《同胞性别结构、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与教育获得》, 《社会学研究》第5期。
- 佐藤宏、李实, 2008, 《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成分、家庭文化和教育》, 《经济学》(季刊)第7期。
- 朱钰洪、常芳、史耀疆, 2017, 《我国西部地区家长参与和学生成绩的相关关系研究》, 《教育经济评论》第3期。
- Aizer, A. 2014, “Rising Inequal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The Role of Public Investments in Human Capital.” *CEISifo Economic Studies*, 60 (2).
- Albright, K. & D. Conley 2004, “American educational polic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Conley, D. & K. Albright (eds.), *After the Bell: Family Background, Public Policy, and Educational Success*. London: Routledge.
- Amin, V., P. Lundborg & D. Rooth 2015,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Schooling: Are Mothers Really Less Important Than Fathers?”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47.

- Åslund, O. & H. Grönqvist 2010, "Family Size and Child Outcomes: Is There Really No Trade-off?" *Labour Economics*, 17 (1).
- Becker, G. S. & H. G. Lewis 1973,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 (2).
- Becker, G. S. & N. Tomes 1976, "Child Endowments and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4 (4).
- 1979, "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7 (6).
- Björklund, A. & K. G. Salvanes 2011, "Education and Family Background: Mechanisms and Policies." In Hanushek, E., S. Machin & L. Woessmann (eds.),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Vol. 3. Amsterdam: The Elsevier.
- Behrman, J. R. & M. R. Rosenzweig 2002, "Does Increasing Women's Schooling Raise the Schooling of the Next Gene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 (1).
- Black, S. E., & P. J. Devereux 2011, "Recent Development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Card, D. & O. Ashenfelter (eds.),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Vol. 4B. Amsterdam: The Elsevier.
- Black, S. E., P. J. Devereux, & K. G. Salvanes 2005a, "Why the Apple Doesn't Fall Far: Understanding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 (1).
- 2005b, "The More the Merrier? The Effect of Family Size and Birth Order on Children's Educ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 (2).
- Bloome, D. 2015, "Income Inequal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Forces*, 93 (3).
- Brown, P. 2006, "Parental Education and Investment in Children's Human Capital in Ru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4 (4).
-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Richardson, J. G.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Campbell, M., R. Haveman, G. Sandefur & B. Wolfe 2005,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cross A Generation." *Focus*, 23 (2).
- Carbonaro, W. J. 1998,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Parents: Intergenerational Closure and Educational Outcome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1 (4).
- Carlson, M. J. & A. G. Van Orman 2017, "Fathers' Investments of Money and Time across Residential Contex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9.
- Carneiro, P. & J. J. Heckman 2002, "The Evidence on Credit Constraints in Post-Secondary Schooling." *Economic Journal*, 112 (482).
- Checchi, D. 2005,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Family Background and Inequ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en, Yuyu, S. Naidu, T. Yu & N. Yuchtman 2015,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20<sup>th</sup>

- Century China."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58.
- Chu, C. Y. Cyrus, Yu Xie & Ruoh-rong Yu 2007, "Effects of Sibship Structure Revisited: Evidence from Intrafamily Resource Transfer in Taiwa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0 (2).
- Coleman, J.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 Conley, D. 2005, *The Pecking Order: A Bold New Look at How Family and Society Determine Who We Become*. Vintage.
- Conley, D. & R. Glauber 2008, "All in the Family? Family Composition, Resources, and Sibling Similarity in Socioeconomic Status."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6 (4).
- Corak, M. 2013, "Income Inequality,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 (3).
- Cunha, F. & J. J. Heckman 2007, "The Technology of Skill 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 (2).
- De Graaf, P. 1988, "Parents' Financi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Grades, and Transitions to Secondary School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4 (3).
- De Haan M. 2010, "Birth Order, Family Size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9 (4).
- Deng, Zhong & Donald J. Treiman 1997, "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rend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2).
- Esping-Andersen, G. 2004, "Unequal Opportunities and the Mechanisms of Social Inheritance." In Corak, M. (ed.) *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n, Y., J. Yi & J. Zhang 2015, "The Great Gatsby Curve in China: Cross-Sectional Inequal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orking Paper*.
- Feng, L., Y. Gai & X. Chen 2014, "Family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Early Literacy: A Comparison of Bilingual and Monolingual Children."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39.
- Guryan, J., E. Hurst & M. Kearney 2008, "Parental Education and Parental Time with Childre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2 (3).
- Hanushek E. 1992, "The Trade-off between Child Quantity and Qua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0 (1).
- Haveman, R. & B. Wolfe 1995, "The Determinants of Children Attainments: A Review of Methods and Finding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3.
- Heckman, J. J. 2006, "Skill Formation and the Economics of Investing in Disadvantaged Children." *Science* 312 (5782).
- 2007, "The Economics, Technology, and Neuroscience of Human Capability Form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4 (33).
- Hertz, T., T. Jayasundera, P. Piraino, S. Selcuk, N. Smith & A. Verashchagina 2007, "The Inheritance of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Fifty-year Trends." *The B. 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7 (2).
- Jæger, M. M. & A. Holm 2007, "Does Parents'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Capital Explain the Social Class Effect

-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Scandinavian Mobility Regim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6 (2).
- Kalb, G. & J. C. Van Ours 2014, "Reading to Young Children: A Head-start in Lif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40.
- Kalil, A., M. Mogstad, M. Rege & M. E. Votruba 2016, "Father Presence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51 (4).
- Kloosterman, R., N. Notten, J. Tolsma & G. Kraaykamp 2011,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Reading Socialization and Early School Involvement on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A Panel Study of Primary School Pupils in the Netherland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 (3).
- Kong, P. 2008: " 'Old Man Moves a Mountain': Rural Parents' Involvement in Their Children's Schooling." *Doctoral Thesis*, Boston: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 Lareau, A. 2002, "Invisible Inequality: Social Class and Childrearing in Black Families and White Famil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 (5).
- Leibowitz, A. 1977, "Parental Inputs and Children's Achievement."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2 (2).
- Li, H., P. Loyalka, S. Rozelle, B. Wu & J. Xie 2015, "Unequal Access to College in China: How Far Have Poor, Rural Students Been Left Behind?" *The China Quarterly* 221.
- Li, Hongbin, Xianguo Yao, Junsen Zhang & Li'an Zhou 2005, "Parental Childcare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Applied Economics*, 37 (18).
- Li, Hongbin, Junsen Zhang & Yi Zhu 2008, "The 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of Children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Identification Using Chinese Twins." *Demography*, 45 (1).
- Li, Zhongda, L. Liu & M. Wang 2014,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and Public Education Spending: Evidence from China."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 Review*, 40.
- Lindberg, L. D., K. Kost & I. Maddow-Zimet 2017, "The Role of Men's Childbearing Intentions in Father Involvemen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9.
- Liu, Airen & Yu Xie 2015, "Influences of Monetary and Non-Monetary Family Resources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in Verbal Ability in China."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40.
- Mayer, S. E. 2002, "How Economic Segregation Affects Childre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Social Forces*, 81 (1).
- McNeal, R. B. Jr. 1999, "Parental Involvement as Social Capital: Differential Effectiveness on Science Achievement, Truancy, and Dropping Out." *Social Forces*, 78 (1).
- Maurin, E. & S. McNally 2008, "Vive la Révolution! Long-Term Educational Returns of 1968 to the Angry Student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6 (1).
- Mayer, S. E. & L. M. Lopoo 2008,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2 (1-2).
- Oreopoulos, P., M. E. Page & A. H. Stevens 2006, "The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s of Compulsory Schooling."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4 (4).
- Pong, S. L. 1998, "The School Compositional Effect of Single Parenthood on 10th-Grade Achievement." *Sociology of*

- Education*, 71 (1).
- Powell, B. & L. C. Steelman 1990, "Beyond Sibship Size: Sibling Density, Sex Composition, and Educational Outcomes." *Social Forces*, 69 (1).
- Reardon, S. F. 2011, "The Widening Academic Achievement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New Evidence and Possible Explanations." In Murnane, R. & G. Duncan (eds.) *Whither Opportunity? Rising Inequality and the Uncertain Life Chances of Low-Income Childre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Roksa, J. & D. Potter 2011, "Parenting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al Advantag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4 (4).
- Rosenzweig, M. R. & K. I. Wolpin 1980, "Testing the Quantity-Quality Fertility Model: The Use of Twins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Econometrica*, 48 (1).
- Rothstein, R. 2010, "Family Environment in the Production of Schooling." In Brewer, D. J. & P. J. McEwan (eds.) *Economics of Education*. Academic Press.
- Sacerdote, B. 2002, "The Nature and Nurture of Economic Outcom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 (2).
- Silles, M. A. 2010, "The Implications of Family Size and Birth Order for Test Scores and Behavior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9 (5).
- Solon, G. 1999,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Labor Market." In Ashenfelter, O. & D. Card (eds.);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Vol. 3A -2. Amsterdam; The Elsevier.
- Steelman, L. C., B. Powell, R. Werum & S. Carter 2002, "Reconsidering the Effects of Sibling Configuration: Recent Advances and Challeng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8.
- Wu, Xiaogang 2010, "Economic transition, School Expansion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1990 - 2000."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8.
- Wu, Xiaogang & D. J. Treiman 2004,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1955 - 1996." *Demography*, 41 (2).
- Zhou, Xueguang, P. Moen & N. B. Tuma 1998,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Urban China: 1949 - 94."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1.
- Zhou, Xueguang & Liren Hou 1999,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64 (1).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郑 磊）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祁 翔）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侯玉娜）

责任编辑：吴 莹